管理学在中国走向了“小农意识”吗？*
——基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30种重要期刊的经验研究

● 曹祖毅[1]　何芬芬[1]　贾慧英[2]
（1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2　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200）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管理学在中国迅速发展并逐渐获得“合法性”。那么，管理学在中国各子学科之间的知识流动性是否充分？还是出现了知识领地现象，阻碍了学科之间的知识传递？其各子学科是否已经陷入了“小农意识”？本文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30种重要期刊数据，运用Log-multiplicative模型、Pathfinder算法与熵值分析等新颖且多元化的实证方法，考察管理学在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小农意识”。检验结果表明：（1）管理学在中国的不同领域和期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不同程度的跨学科融合演进；（2）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财会金融等五个领域与其他子学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知识交流与扩散；（3）《管理世界》等期刊促进了不同领域与期刊之间的知识双向流动，而《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有助于维护子学科交叉融合网络的稳定性。

【关键词】管理学在中国　小农意识　学科交叉　实证研究　基金委30种期刊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整体及其各子学科均取得了真正的进步（谭力文，2013；张正堂，2023），进入21世纪后更是日新月异、方兴未艾，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共同体的普遍关注（曹祖毅等，2017）。在这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管理学在中国的科学演进既需要遵循知识的有效分工规律以提高范式的常规化程度（Kuhn，1970），又需要借鉴不同的学科以促进与其他领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中国组织管理知识的理论化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JHQ093）；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科建设项目“CEO居安思危的定义、测量及其影响研究”（X2662024JGPY004）。

通讯作者：贾慧英，E-mail：jhy0727@126.com。

域的融合发展。虽然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及其各领域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应该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ity）（Agarwal and Hoetker，2007），甚至认为这是知识创造与积累的一种自然方式，但是随着学科“合法性”的逐渐获得（Barney and Zhang，2009；Tsui，2009），已经有学者开始担心，如果过于追求范式的“科学革命”，就可能导致管理学在中国各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充分的信息交换与有效的知识交流，从而大大降低跨学科程度以至于陷入各自的“小农意识”（parochialism）（March，2004）。本文认为，March（2004）将“小农意识”① 这一概念引入管理学科引发了关于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些必要思考。在 March（2004）的基础上，本文将“小农意识”定义为：研究社区中存在的一种地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局限性或狭隘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学术群体相对孤立，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存在障碍，但同时也为保护和发展独特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定条件（March，2004）。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管理学在中国各子学科之间的知识流动性是否充分？还是出现了知识领地现象，阻碍了学科之间的知识传递？换言之，本文基于期刊与子学科的视角考察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管理学在中国近年来是否已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小农意识”的知识分布格局。

不少学者认为，“小农意识”这一概念在考察管理学科之间知识的开发（exploitation）与探索（exploration）平衡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如 March，2004）。与知识边界和知识流动这些更通用的概念相比，March（2004）意义上的“小农意识”概念更具体地指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管理学科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学科内部的知识开发与探索之间的平衡（Clark et al.，1999；2019；Ozbilgin，2004）。学术期刊作为链接理论知识与实践世界的重要桥梁以及管理思想的重要载体（如 Daft and Lewin，2008），为窥探管理知识流动以及学科交叉动态提供了一种理想渠道（如 Pieters and Baumgartner，2002；Nurer et al.，2015），既是由制度环境和学术规范等要素塑造的文化环境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环境产生塑造与反馈作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在子学科范畴、文化情境、发展历程等多个方面存在本质差别（Tsui，2009），“小农意识”问题在中国管理学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可能与西方有所不同，所以急需开展系统、动态与客观的经验研究。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仅探讨了 1980—2008 年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 30 种重要期刊的知识生产特征与社会网络维度（张紫琼等，2010；张自立等，2012；张自立等，2011），且主要基于比较单一的方法和有限的视角。这限制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程度和三角验证水平（Scandura and Williams，2000），以及对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深入与系统理解，同时也对管理学在中国的具体子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特征与动态考察不够充分。因此，本文采用科学严谨与比较多元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基于 2006—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30 种重要期刊之间的纵向引文数据，从多个维度考察管理学在中国的“小农意识”倾向及其相应的演变路径。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1）管理学在中国的不同领域和期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不同程度的跨学科融合演进；（2）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财会金融、农业与公共管理以及科学学与政策等五个领域与其他子学科之间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知识交流与扩散；（3）一些期刊有效促进了管理学在中国不同领域与期刊之间的知识双向流动，而另一些期刊有

① 虽然马奇（March，2004）对“parochialism”这一理论概念的研究在管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截至目前尚未在国内管理学主流与权威的刊物上看到对这一词的合适中文翻译。本文借鉴了费孝通（Fei et al.，1992）将“小农意识”与“parochialism”互译的相关做法，将之译为“小农意识”。

助于维护子学科交叉融合网络的稳定性。这不仅能够有效揭示期刊之间的知识流动与互动，还能从期刊层面这一认知维度（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管理学科内外部文化环境、制度环境与学术规范对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并为学科未来的科学演进与跨学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首先，动态刻画了管理学在中国各子学科的近期知识结构，尤其是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不同的子学科在知识传播社会网络中的“合法性”定位以及不同的期刊（如《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在维护子学科交叉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稳定性①。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超越了常规的期刊考察方法，通过比较新颖、比较客观、比较多元的实证方法（如同时采用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Pathfinder 算法与熵值分析）互相结合，既提高三角验证水平，又从期刊与学科层面描绘管理学在中国的成长路线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最后，在将“小农意识”这一理论概念应用于管理学在中国的重要期刊时，既考察了其在中国本土情境的特殊性并推进了这一理论概念的使用边界，又为管理学在中国各子领域跨学科融合发展以及保持开发与探索的平衡提供理论与经验指导，同时还为中国管理知识如何对其他学术领域与其他期刊产生学术相关性（Corley and Gioia，2011；Daft and Lewin，2008），奠定重要的方法与逻辑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遴选的 30 种重要学术期刊的质量，更不是对其排名，而是通过这些重要的知识平台与创新载体窥探管理知识如何在不同期刊以及各子学科领域之间进行有效流动、创新扩散与交叉融合。

2. 文献回顾

2.1 小农意识

虽然 20 世纪以前已经有学者对“小农意识”（parochialism）进行了一定的考察，但却是 March（2004）将这个概念在管理学中进行背书与推广，并对管理研究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March（2004）认为，从期刊的编辑团队、作者与引文关系来看，现有的主流管理研究比较偏向欧美范式；虽然欧美之间有充分的交流，但是因为地区主义、民族主义与文化自豪感的存在而导致这两个地区之间也存在“小农意识”意义上的不同科学共同体；而如果将欧美之外的学术共同体都包括进来之后，那么“小农意识”恐怕在管理研究中就更加普遍了，由此产生的不同共同体之间彼时并没有充分的学术对话与交流，从而也导致管理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碎片化发展。虽然 March（2004）其实并没有对“小农意识”进行严格与清晰的定义，但是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利弊并存的非

① 现有学者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 30 种期刊的探讨，主要基于 2008 年之前的数据，而且几乎没有单独考察具体的学术期刊与具体的子学科领域对管理学在中国的整体知识网络的稳健性维护。一些期刊和一些子领域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性，将通过下文的经验数据予以说明。

贬义词。在 March 的视角下，“小农意识”更可能是保持管理知识的开发与探索平衡的一种必然产物，也可能是管理学取得真正进展的一种自然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分布格局。根据 March 的判断，当“小农意识”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时，管理学者以及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均需要保持知识开发与知识探索的必要张力，并警惕过度开发或者过度探索对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而中国管理研究的兴起，如果可以深谙“小农意识”的优点与缺点并能够扬长避短，那么一定是对西方主流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也应该是平衡管理学理论收敛与理论发散之必要张力（Fabian，2000）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力量。

严格来讲，“小农意识”这个概念并不是 March（2004）首创，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详见表 1）。由此可见，“小农意识”由 March、Daft、Lewin、Nerur、费孝通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共同推动，目前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持续与充分关注。不过，现有研究主要是关注西方管理学的相关议题以及中西管理学的联系，还没有考察（尤其是基于中文数据）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小农意识”问题，特别是尚未考察与西方文化环境迥异下的中国管理学不同期刊与不同子学科领域之间的“小农意识”问题。本文认为，当前，国内管理学研究在与国际接轨以及推动本土理论创新过程中，迫切需要深入理解和解决可能存在的“小农意识”问题，以促进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管理思想与文化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正如管理思想史大师 Wren 和 Bedeian（2009）所指出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如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的一种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一种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会诞生什么样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的发展本身又会反过来影响与改变文化环境。因此，“小农意识”这一特定现象在学术领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学术规范构成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与演化；对管理学在中国演变的“小农意识”问题开展研究，需要考虑制度环境、学术规范等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期刊作为管理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重要载体（Daft and Lewin，2008；Mandard，2022），一定也既直接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与赋能，又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其产生塑造和反馈作用。在学术领域，期刊在管理知识传播与交流中占据核心地位，正如 Pieters 和 Baumgartner（2002）所言，期刊引文网络是特定的社交网络，其中参与者是期刊，有价值的资源是思想和知识，而互动是期刊之间的引文关系。期刊引文网络反映了期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互惠引用、单向引用或无引用），可以揭示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结构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学科思想迁移模式，是研究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窗口（Pieters and Baumgartner，2002；Nurer et al.，2015；Daft and Lewin，2008），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制度环境与学术规范的特征和变化，甚至期刊之间的引文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特征与学术规范（Mandard，2022）。

表 1　**“小农意识”相关研究演化脉络**

作者/年份	主要观点	主要贡献
Adler（1991）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呈现一定的“小农意识”，而美国由于较少关注其他语言、对其他文化不感兴趣等原因，导致其“小农意识”倾向更加明显	强调文化差异对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与融合的影响，与“小农意识”阻碍管理知识在不同学术共同体间流动传递的核心概念紧密相关，为后续研究“小农意识”在管理学中的表现奠定了基础

续表

作者/年份	主要观点	主要贡献
Clark 等（1999）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HRM）研究领域中存在两种形式的“小农意识”，一是该领域往往未认识到早期研究的方法复杂性与重要发现对国际企业管理研究的影响；二是其他国家的国际企业研究未对主流的英语期刊上的理论建构产生实质性的启发	通过识别 IHRM 领域中存在的“小农意识”现象，指出知识开发与探索的平衡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为剖析管理学各子学科间可能存在的“小农意识”问题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视角与实例参考
费孝通（1992）	在社会学领域对“小农意识”的社会文化根源和表现形式进行深刻探讨，将“小农意识”定义为“村民限制了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他们不会走很远；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他们过着比较保守的生活；他们维持着比较孤立的社交圈”	为理解管理学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小农意识”提供了深刻的文化背景视角，有利于从更宏观的视角理解管理学中的知识流动和学科交叉问题，为后续通过实证方法探究各期刊和子学科间的知识互动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Ozbilgin（2004）	通过对 22 种权威期刊的编辑团队进行分析并考察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小农意识”问题，发现该领域主要被欧美范式与文化所主导	提供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小农意识”的典型案例，提出了解决该领域“小农意识”问题的对策，为研究管理学整体的“小农意识”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March（2004）	引入“小农意识”概念，认为管理学中的“小农意识”导致知识碎片化，形成核心与非核心范式的中心-外围格局，反映了知识开发与探索的张力，强调管理学健康发展需平衡知识开发与知识探索	强调管理学研究中的地域性、文化局限性、知识开发与探索的平衡，以及呼吁避免管理学的碎片化现象，为研究中国情境下“小农意识”的独特表现和影响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Daft 和 Lewin（2008）	将“小农意识”定义为“可以发生在任何期刊上并在不同学术社区内不断演化的知识狭隘性”，认为西方顶级学术期刊受到某种程度的“小农意识”影响	强调期刊在管理知识传播中的作用，既在不同导向的管理学期刊之间形成充分的知识传递与分享格局，又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与管理者所面对的实践问题
Nerur 等（2015）	SMJ 是吸收与传递管理知识的网络中枢，战略管理领域与金融学、社会学等学科交流频繁。“小农意识”在学术期刊中不可避免，不同智力群体之间缺乏交流而形成知识狭隘格局，可以通过鼓励不同的智力群体之间的知识流动解决	在 March 等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小农意识”在学术期刊和学科发展中的具体表现，通过对期刊间知识流动关系的分析，为考察管理学在中国的“小农意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思路借鉴

因此，本文借鉴 Meredith 和 Pilkington（2018）、Nurer 等（2015）以及 Pieters 和 Baumgartner（2002）等国际主流的研究方法，主要从期刊层面这一认知维度（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出发并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30 种期刊的引文数据，本身就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学术规范的重要体现；通过分析期刊之间的引用模式、特征与变化，能够深入了解管理思想在学术社群中的传播与互动，进而洞察管理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小农意识”及其程度。正如前文所述，造成“小农意识”问题的影响因素除了来自期刊层面，还有制度环境、学术规范等其他文化环境因素，甚至还有其他外部因素（如学科壁垒、学术圈人际关系等）。我们深知，仅在一篇文章中过多地关注制度环境、学术规范以及其他变量如何直接影响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小农意识”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与本文关注的焦点即从期刊层面对“小农意识”问题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窥探进行互动与交互，这既不是本文的研究初衷（容易喧宾夺主），又不是一个容易测量并在比较有限的版面情况下能够说清楚的研究议题，甚至过多考虑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还会导致本文过于臃肿。故本文主要从期刊层面切入，考察管理学在中国演变的“小农意识”问题，以保证科学研究的简洁性与深入性（Scandura and Williams，2000）①。

2.2 相关研究方法概述

基于管理学顶级期刊进行学科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国际主流学术共同体的一种常用方法（Agarwal and Hoetker，2007）。个体研究者、机构、期刊和学科都嵌入在与其他个人、机构、期刊及学科所构成的互动社会网络之中（如 Nurer et al.，2015）。这些社会网络内部和之间的流动可以体现在认知层面（即知识）、表达层面（即情感）、工具层面（即权力）或客观（objective）层面（即商品和资本）（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学术领域中的知识流动在认知维度上通过引用模式得以充分体现（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这种引用模式反映了期刊间知识流动的直接关系，是可量化和客观的。一方面，引文是识别论文、学者或期刊贡献的关键指标（Mingers and Leydesdorff，2015）；另一方面，引文能够揭示研究领域的起源与演变（Mingers and Leydesdorff，2015），通过追踪期刊之间的引用轨迹，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领域及其之间的学科交叉动态。在现有研究中，Agarwal 和 Hoetker（2007）基于 AMJ 考察了管理学和社会学、经济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纵向互动关系，Pieters 和 Baumgartner（2002）研究了经济学期刊之间的跨学科知识交流格局，Meredith 和 Pilkington（2018）基于 MS、AMJ、ASQ、AMR、HBR、JOM 等权威期刊窥探了运营管理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引文网络关联；Shafique（2013）的引文分析表明，最初跨学科交融的创新研究领域，逐渐走向了管理学和经济学两个阵地，即这个领域在管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内部越来越走向知识狭隘的格局。这些研究均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伴随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

① 对此，本研究团队将来计划从制度环境与学术规范等更加广泛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小农意识”的其他成因与影响因素，以及这些成因与影响因素如何同期刊层面的研究发现进行互动，并将之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并相信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农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管理学在中国演变的“小农意识”现象，并为促进学术界的开放性和跨学科合作提供策略建议。

深化，中文管理学期刊作为文化环境的深刻体现以及管理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知识载体（Wren 和 Bedeian，2009），除了是自身蜕变的真实写照以外，还不断积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Van de Ven and Johnson，2006），是管理学在中国起步、演进与成长的历史缩影。因此，选择中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并考察期刊之间的引文网络、引文特征与引文动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窥探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比如本文所关心的“小农意识”问题。

在现有的中文管理学期刊列表中，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力、比较权威，也比较受认可的应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 30 种重要期刊（周泽将等，2021）。作为 2006 年甄选的一个结果（张金隆等，2014；张自立等，2011），这些期刊既是中国各大商学院认定的重要知识载体，也是管理学在中国不断取得进步与获取合法性的重要体现与里程碑。在鲜有的相关研究中，张自立等（2012）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从异质知识交流能力的视角考察了 1980—2009 年这 30 种学术期刊的结构洞相关指标，张紫琼等（2010）则重点考察了 1980—2008 年这 30 种期刊由引文关系而构成的社会网络聚类特征，张自立等（2011）则通过社会网络的中心性指标与凝聚子群分析探讨了每一种期刊的相对影响力。由此可见，虽然已有少数学者尝试基于纵向的历时数据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 30 种期刊之间的知识结构与聚类特征，为学者继续探讨相关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主要基于比较单一的方法和有限的视角，特别是对管理学在中国演进的“小农意识”研究比较缺位。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上述 30 种期刊为考察管理学在中国的“小农意识”问题提供了条件，正如 Daft 和 Lewin（2008）所言，关注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就是解决“小农意识”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本文认为“小农意识”既体现在期刊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上，又体现在中国管理学不同子学科之间的知识交互上，同时还体现在期刊作为知识传递者在交叉学科网络的稳定性维护上。正如 Nurer 等（2015）发表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的文章通过认知层面①（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基于期刊之间的引文网络——考察战略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学）的互动关系一样，本文也旨在从期刊之间的引文关系、引文网络与引文动态这一认知层面出发，解释管理学在中国演变过程中各子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捕捉不同知识社群与学科之间知识流动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追踪引文模式及其演变动态（如 Daft 和 Lewin，2008；Shafique，2013）。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同时采用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社会网络分析、Pathfinder 算法与熵值分析等相对比较新颖的分析方法，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客观、严谨地分析管理学在中国的知识流动、学科交叉和网络稳定性状况，以确保对期刊行为的准确识别和全面理解，为理解管理学在中国的跨学科发展趋势提供支持。

① 这些认知层面的影响因素（比如本文的期刊之间的知识流动）之外的其他层面因素（表达层面、工具层面或者客观层面），比如学科壁垒、学术圈人际关系等外部因素（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不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本文的研究初衷与出发点，主要是借鉴 Nurer 等（2015）的相关做法，从期刊之间的知识流动这一认知层面出发，捕捉管理学在中国演变的过程中各子学科之间知识交流的动态与差异。然而，对于其他外部因素及其对本文的认知层面因素的影响与交互，将是本研究团队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筛选

本文考察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 30 种重要期刊的“小农意识”问题，将时间窗口定位在 2006—2017 年，主要因为这些期刊是 2006 年甄选的结果（张金隆等，2014），故 2006 年为探讨本文的研究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时间窗口起点。同时，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历史进程中，部分期刊有更名现象，如 1984 年创刊的《中国管理科学》在 1993 年更名之前的原名是《优选与管理科学》；再如 1992 年创刊的《系统管理学报》在 2006 年更名之前的原名是《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因为 2006 年之前这些样本期刊虽然名称不同，但确实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周期内，为其他期刊积累了有效的引文数据，即施引期刊对被引期刊的引用（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层面均是期刊，而不是作者或者论文），不仅会引用 2006—2017 年的参考文献，也很有可能引用之前的参考文献；但是 2006 年之后，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周期内，这 30 种期刊均没有再更名的现象。因此，为了确保分析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本文选择 2006 年作为时间起点。因为期刊之间产生引文关系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曝光，录入权威的引文数据库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Bergh et al.，2006；Gates et al.，2019），如 Bergh 等（2006）在 SMJ 上探讨 SMJ 的学术合法性影响因素时，就使用了 1990—1999 年的数据；再如 Meredith 和 Pilkington（2018）在 JOM 上考察运营管理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知识交换时，将时间窗口界定在 1980—2009 年；而中文的学术期刊引文数据库同样存在这两种时间滞后期，所以本文选择 2017 年作为时间窗口的终点，从而使得这些中文管理学期刊之间有足够的引用与被引用时间积累。

3.2 建立数据矩阵

在期刊与时间窗口设定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引文数据库收集 30 种期刊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数据①。为了同时从动态演变的视角窥探 2006 年以来管理学在中国不同期刊与不同子领域之间的知识流动动态，本文将 2006—2017 年整体时间跨度均分为 2006—2009 年、2010—2013 年与 2014—2017 年三个子时间区间②，同时收集整体跨度与各子区间内 30 种期刊之间的引文关系数据，从而建立相应的关系矩阵，用以进行下文的 Log-multiplicative 分析、社会网络分析、Pathfinder 分析与熵值分析。每一个数据矩阵表示期刊与自己或者其他期刊之间的引用关系，如表 2

① 在 CNKI 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学者可分析期刊、作者、地区、高校等多项统计数据。

② 本文认为将 12 年的时间窗口平均划分为 3 个时间跨度的子区间（每个区间覆盖 4 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是因为再细致的划分（如每 2 年一个时间周期）会导致每个时间周期太短而不能清晰地观察到纵向的引文变动趋势，而且往往会产生较多的图表数据，导致学者的认知偏差；二是因为再笼统的划分（比如每 6 年一个时间周期）会导致不利于观察与揭示相应数据的纵向演变动态与规律（Nerur et al.，2015）。

所示，在2014—2017年管理世界①引用管理科学学报39次，引用中国软科学75次，被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引用122次，自引1510次。

表2　**期刊之间引文流动的一个部分数据矩阵（2014—2017年）**

	被引期刊						
施引期刊	期刊名称	管理科学学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管理世界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软科学	金融研究	……
	管理科学学报	1200	224	143	49	18	168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45	2208	122	125	62	35	……
	管理世界	39	13	1510	86	75	388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3	23	238	484	49	129	……
	中国软科学	42	37	451	111	727	147	……
	金融研究	33	15	499	113	24	1514	……
	……	……	……	……	……	……	……	……

3.3　数据分析方法

3.3.1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管理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期刊之间的知识交流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小农意识”及其程度，Log-multiplicative模型不仅可以分析期刊的影响力和地位，还能通过揭示知识流动的方向和强度，判断期刊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处理期刊引用关系数据方面，它能够克服传统的多维尺度分析（MDS）、log-linear模型等方法在处理非对称矩阵数据时的常见问题（比如多维尺度分析的维度数量不好确定，只能够根据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需要为期刊分配足够的参数等），可直接对本研究中的期刊引用关系矩阵进行尽量避免主观判断、无须赋予模型复杂参数的有效分析（Pieters and Baumgartner，2002）。同时，该模型还能够精准界定行与列关系的最优维度M值，更精准地揭示知识流动的方向和强度，评估期刊作为知识来源和知识吸收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更加真实与客观地揭示期刊之间的知识流动情况（Nerur et al.，2015）。其他模型如传统多维尺度分析（MDS）、log-linear模型等方法无法从如此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分析期刊关系，也难以有效回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选用该模型来计算相关的核心参数。

如模型（1）所示，F_{sr}表示关系矩阵数据；s和r分别指行（施引期刊，citing journals）与列

① 因本研究的样本是中文期刊，会多次出现，所以为节省空间，下文均省略了期刊名称的“《》”。

（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s）；u 是 log-linear 模型中的一个参数；δ_{sr} 反映关系矩阵中对角线的数据，即期刊的自我引用数据；$\sum_{m=1}^{M} \xi_s^m \psi^m \xi_r^m$ 衡量期刊之间因为互相引用与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内聚力（cohesion）；m 表示行与列的维度关系取值。其中，本文主要关心模型中的 u_s^S 与 u_r^R 两个值，前者反映施引期刊引用其他期刊的程度与影响力（storer），而后者表示被引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程度与影响力（sourcer）。为此，本文应用 Vermunt（1997）编制的 *l*EM 软件，输入各个时期的关系矩阵数据，确认好行与列关系最优值 M 后①，获得每个时期内每种期刊相应的 u_s^S 与 u_r^R 参数值。

$$\log F_{sr} = u + u_s^S + u_r^R + \delta_{sr} + \sum_{m=1}^{M} \xi_s^m \psi^m \xi_r^m \tag{1}$$

3.3.2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不同的图形节点和节点大小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各种期刊在知识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不同子学科领域之间的知识流向和交互程度；此外，能明确在知识交流网络中的关键期刊或领域（即关键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强连接或弱连接）（Meredith and Pilkington，2018）。因此，综合考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设定的各子学科范畴②、每种期刊的官网介绍与实际刊登的文章主题以及现有文献的相关聚类方法（Nerur et al.，2015；Sullivan et al.，2011），本文在 Meredith 和 Pilkington（2018）的基础上，将中国管理学 30 种重要期刊大致归类到以下五个子学科领域③：

管理科学与工程（10 种期刊）：管理科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系统工程学报、系统管理学报、运筹与管理、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与管理、数理统计与管理。

财会金融（3 种期刊）：会计研究、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工商管理（8 种期刊）：管理评论、管理世界、管理学报、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预测、研究与发展管理、管理科学。

科学学与政策（5 种期刊）：情报学报、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软科学。

农业与公共管理（4 种期刊）：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公共管理学报。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因为不同领域的期刊特性、每期文章数量、引文要求、篇幅等不同因素同时存在，不同期刊之间的引用行为很可能存在一定的系统差异（Biehl et al.，2006），所以在开展下文的子学科社会网络分析时（见图 1 至图 4），本文借鉴 Biehl 等（2006）的做法，对每个时期内

①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中行与列关系的最优维度 M 值取决于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因为不同的 M 值会产生不同的 BIC 值，当 BIC 取得最小值，即为 M 的最优维度取值，更为详细的算法与相关介绍，可参考 Pieters 和 Baumgartner（2002）一文。这些相关取值都可以通过 *l*EM 程序的输出窗口获得。

②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学科领域划分可参考官网：http：//www. nsfcms. org/index. php？ r=intro/institution。

③ 因中国管理学发展定位的缘故，本文主要借鉴 Meredith 和 Pilkington（2018）的做法，综合考虑每种样本期刊的栏目设置与其参考文献的性质，将每一种期刊归类到一个具体的子学科领域。

每一种期刊的引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做法是将每一行（代表一种期刊）中每一个矩阵数据（A_{ij}）除以该行所有去除自引数据（A_{ii}）之和 $\left(\sum_{j=1}^{30} A_{ij} - A_{ii}\right)$，从而将每一个原始矩阵数据转换成新的标准化矩阵数据（A'_{ij}），即：

$$A'_{ij} = \frac{A_{ij}}{\sum_{j=1}^{30} A_{ij} - A_{ii}} \tag{2}$$

第二，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不同期刊之间的互相引用关系，本文借鉴 Pilkington 和 Meredith（2018）的做法，选择 $A'_{ij} \geqslant 0.06$ 的引文数据进行分析与可视化呈现。

第三，在所生成的期刊引文社会网络图中，本文借鉴 Pilkington 和 Meredith（2018）的做法，用不同的图形节点表示所对应的期刊在管理知识吸收与传递（引用与被引用）方面的能力和程度；主要做法是，计算每种期刊的被引用数据之和（去除自引）与引用其他期刊数据之和（去除自引）的比值（$R_{i/j}$）：

$$R_{i/j} = \frac{\sum_{i=1}^{30} A_{ij} - A_{ii}}{\sum_{j=1}^{30} A_{ij} - A_{ii}} \tag{3}$$

若 $R_{i/j} \geqslant 1.5$，则认为期刊 i/j 属于知识来源期刊（source）；若 $R_{i/j} \leqslant 0.5$，则认为期刊 i/j 属于知识存储期刊；若 $0.5 < R_{i/j} < 1.5$，则认为期刊 i/j 属于知识传递期刊。本文用“▲”表示第一种情况，用“◆”表示第二种情况，用“●”表示第三种情况。

第四，每个图形节点大小反映相对应期刊之被引用数据（标准化）与施引数据（标准化）的比值，而不是绝对的引用或被引用数值。

第五，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操作所采用的软件主要是 Ucinet 和 Pajek。

3.3.3 Pathfinder 算法与熵值（Entropy）分析

Pathfinder 算法最早被用于认知心理学，近来也经常被用在其他研究领域（Nerur et al.，2008；Sullivan et al.，2011）。Pathfinder 算法通过分析相似或不相似矩阵产生 PFNet 图。借助这一算法产生的 PFNet 图，学者可以洞察网络节点（如本文的期刊）之间因为引用与被引用而产生的最强联系，得到节点之间因为存在双向的知识流动关系而产生的知识聚类，以及发现网络图中的中心与外围节点及其相应的关键角色（Nerur et al.，2015）。换言之，在 Pathfinder 算法下，如果两种期刊同时存在引用与被引用数据，即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的引用行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两种期刊处于同一个聚类当中，以此类推（Nerur et al.，2015；Sullivan et al.，2011）。因此，通过 PFNet 图，本文既可以窥探中国管理学重要期刊及其所代表的子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又可以评估每一种期刊对网络稳定性与有序性的贡献程度（Cooper et al.，1993）；与现有的知识图谱侧重于展示知识领域的结构关系、主题聚类主要关注主题分布不同，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新颖性。

除了 PFNet 图以外，熵值也可以更为具体地反映每一个网络节点（本文即为期刊）对网络的稳定性与有序性的贡献水平。根据 Nerur 等（2015）、Sullivan 等（2011），整体网络的熵值或无序性 I_e

可以通过模型（4）计算得出。

$$I_e = \frac{1}{\lg_{10}2} \times \lg_{10}\left(\frac{N!}{N_1!\ N_2!\ N_3!\ \cdots N_s!}\right) \tag{4}$$

其中，N 表示相应网络图中——或是某一个时间区间，或是整体网络，或是去掉某一个节点（期刊）后的剩余网络——所包含的节点数量，N_1 表示相应网络图中第 1 个聚类中的节点（期刊）数量，依次，N_s 表示相应网络图中第 s 个聚类中的节点（期刊）数量。对于每一种期刊，在通过 Pathfinder 算法得出的 PFNet 网络结果基础上，本文计算当这种期刊缺位时（$N=29$）的剩余网络熵值（I'_e）与包含这种期刊（$N=30$）的整体网络熵值（I_e）之差；换言之，借鉴现有学者的做法，本文用这样的差值（可正可负）来客观衡量每一种期刊对其所在的 PFNet 的稳定性维护与有序性贡献的程度。

4. 结果分析

4.1 Log-multiplicative 分析

对于每一个时间周期，本文通过 *l*EM 软件确定了可以最好反映施引期刊与被引期刊之间的维度 M 的最小 BIC 值（Pieters and Baumgartner，2002），从而科学得出每种期刊的 u_s^S 值与 u_r^R 值：对于 2006—2017 年整体时间窗口，当 M 等于 13 时，BIC 取最小值-1694；在 2006—2009 年，当 M 等于 7 时，BIC 取最小值-3378；对于 2010—2013 年，当 M 等于 9 时，BIC 取最小值-2869；对于 2014—2017 年，当 M 等于 11 时，BIC 取最小值-2328。基于此，表 3 和表 4 分别呈现了每种期刊在最优维度 M 时相应的 storer 值与 sourcer 值，以表示从其他期刊吸收管理知识与对其他期刊产生学术影响力的程度。其中，因为每个周期内所有期刊的 storer 值或 sourcer 值之和均为 0，所以大于 0 的值表示这种期刊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而小于 0 的值表示这种期刊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Nerur et al.，2015；Pieters and Baumgartner，2002）。

在表 3 中，中国管理科学（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5、第 6、第 1）、系统工程（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第 5、第 2）、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1、第 1、第 9）、管理评论（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8、第 2、第 4）等期刊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从基金委设定的其他管理学期刊吸收知识，可能令人比较意外的是，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学者普遍认为比较重要的期刊却相对较少从其他中文期刊吸收管理知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2006 年以来这些期刊逐渐加快了国际化步伐，从而导致其相对比较侧重引用西方的英文管理学期刊（曹祖毅等，2018）。从表 4 可知，管理世界（三个时期的 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1、第 1、第 1）、中国工业经济（三个时期的 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3、第 4、第 2）、金融研究（三个时期的 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11、第 8、第 3）、中国软科学（三个时期的 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第 3、第 4）、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三个时期的 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5、第 5、第 5）等期刊对其他期刊的影响力自 2006 年以来均比较大，而之前 storer 值比较大的期刊并没有

同等程度地对其他期刊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综合表 3 与表 4 的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结果可知，无论从整体时间窗口还是从纵向的动态时间变化来看，可能比较出人意料的是，部分期刊如农业经济问题（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6、第 27、第 28，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8、第 27、第 26）、中国农村经济（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9、第 30、第 29，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7、第 26、第 24）、公共管理学报（三个时期的 stor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28、第 29、第 30，sourcer 值排序分别是第 30、第 29、第 28）既没有大量引用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其他期刊，也没有对其他期刊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这是管理学在中国演进的一个初步分析结果，也是学术群体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一个议题。

表 3　　**施引期刊的影响力（storer 值）**

序号	期刊名称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2006—2017 年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1	管理科学学报	−0.16	21	0.06	15	0.12	16	0.13	14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0.49	9	0.76	8	1.02	6	0.88	7
3	管理世界	0.23	13	0.22	14	0.05	18	0.10	15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0.24	12	−0.33	22	−0.57	23	−0.35	20
5	中国软科学	1.07	3	0.83	7	0.72	8	0.81	8
6	金融研究	−0.15	20	−0.47	24	−0.77	24	−0.55	25
7	中国管理科学	0.90	5	0.95	6	1.33	1	1.19	1
8	系统工程学报	−0.58	25	−1.06	25	−0.25	19	−0.55	24
9	会计研究	−1.37	27	−1.58	28	−1.00	26	−1.26	27
10	系统管理学报	0.03	17	0.24	13	0.16	15	−0.37	21
11	管理评论	0.50	8	1.03	2	1.07	4	1.17	2
12	管理工程学报	0.19	14	0.06	16	0.31	13	0.20	13
13	南开管理评论	−0.10	19	−0.16	19	−0.27	20	−0.22	18
14	科研管理	0.80	7	1.00	4	1.08	3	0.95	6
15	情报学报	−1.92	30	−1.18	26	−1.08	27	−1.19	26
16	公共管理学报	−1.54	28	−1.64	29	−2.13	30	−1.62	29
17	管理科学	0.38	11	0.34	12	0.50	11	0.36	11
18	预测	0.12	16	0.05	17	0.11	17	−0.06	17
19	运筹与管理	0.41	10	0.65	10	1.06	5	0.75	9
20	科学学研究	0.82	6	0.72	9	0.54	10	0.66	10
21	中国工业经济	−0.42	23	−0.42	23	−0.92	25	−0.45	23
22	农业经济问题	−1.22	26	−1.21	27	−1.70	28	−1.41	28
23	管理学报	0.98	4	1.01	3	0.83	7	0.96	5

续表

序号	期 刊 名 称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2006—2017 年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0. 16	22	−0. 24	20	−0. 28	21	−0. 24	19
25	系统工程	1. 10	2	0. 96	5	1. 25	2	1. 05	4
26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 52	1	1. 07	1	0. 64	9	1. 05	3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0. 18	15	−0. 03	18	0. 18	14	0. 05	16
2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0. 52	24	0. 36	11	0. 42	12	0. 27	12
29	数理统计与管理	−0. 04	18	−0. 29	21	−0. 57	22	−0. 44	22
30	中国农村经济	−1. 76	29	−1. 70	30	−1. 86	29	−1. 86	30

表 4　**被引期刊的影响力（sourcer 值）**

序号	期 刊 名 称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2006—2017 年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1	管理科学学报	0. 93	7	0. 91	6	0. 89	6	0. 86	7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1. 16	5	1. 02	5	0. 93	5	0. 95	4
3	管理世界	1. 54	1	1. 92	1	2. 19	1	1. 92	1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 17	4	1. 11	2	0. 75	10	0. 86	6
5	中国软科学	1. 22	2	1. 04	3	1. 01	4	1. 02	3
6	金融研究	0. 70	11	0. 69	8	1. 11	3	0. 92	5
7	中国管理科学	0. 98	6	0. 71	7	0. 69	11	0. 77	8
8	系统工程学报	−0. 27	21	−0. 84	25	−0. 69	22	−0. 74	23
9	会计研究	0. 39	15	0. 27	16	0. 37	14	0. 24	17
10	系统管理学报	−0. 16	19	−0. 37	20	−0. 72	23	−0. 38	20
11	管理评论	−0. 09	18	0. 07	17	0. 62	12	0. 32	15
12	管理工程学报	0. 78	10	0. 46	13	0. 25	15	0. 35	14
13	南开管理评论	0. 60	12	0. 53	11	0. 78	7	0. 56	11
14	科研管理	0. 79	9	0. 60	9	0. 78	9	0. 66	9
15	情报学报	−2. 01	29	−2. 47	30	−2. 77	30	−2. 49	30
16	公共管理学报	−3. 06	30	−1. 78	29	−1. 33	28	−1. 59	29
17	管理科学	0. 03	17	−0. 05	18	−0. 13	19	0. 01	18
18	预测	0. 41	14	−0. 20	19	−0. 67	21	−0. 33	19
19	运筹与管理	−0. 81	24	−0. 70	24	−0. 98	25	−0. 82	24

续表

序号	期 刊 名 称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2006—2017 年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20	科学学研究	0. 54	13	0. 59	10	0. 78	8	0. 61	10
21	中国工业经济	1. 18	3	1. 04	4	1. 21	2	1. 08	2
22	农业经济问题	−1. 84	28	−1. 34	27	−1. 05	26	−1. 34	27
23	管理学报	−0. 26	20	0. 46	14	0. 14	16	0. 39	13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1. 15	25	−1. 54	28	−1. 89	29	−1. 36	28
25	系统工程	0. 81	8	0. 37	15	−0. 12	18	0. 26	16
26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0. 38	16	0. 48	12	0. 51	13	0. 48	12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0. 34	22	−0. 43	21	−0. 54	20	−0. 55	22
2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 33	26	−0. 69	23	−0. 05	17	−0. 38	21
29	数理统计与管理	−0. 61	23	−0. 66	22	−1. 31	27	−0. 95	25
30	中国农村经济	−1. 68	27	−1. 18	26	−0. 78	24	−1. 33	26

4. 2 子学科社会网络分析

图 1 至图 4 分别是 2006—2017 年、2006—2009 年、2010—2013 年与 2014—2017 年等不同周期内中国管理学各子学科之间的整体和动态知识传递与扩散图。在每一个时间跨度内，本文用不同的图标分别表示不同的学科领域。由图可知，在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内，管理科学学报的影响力 $R_{i/j}$ 值一直都比较大（三个时期 $R_{i/j}$ 从 2. 07 到 1. 87 再到 2. 53），超越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的 $R_{i/j}$ 值（从 1. 64 到 1. 73 再到 1. 61），二者一同成为与其他子学科领域进行知识交互的重要媒介；财会金融领域中三种期刊的节点一直都比较大，金融研究（$R_{i/j}$ 值从 1. 45 到 1. 36 再到 2. 56）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R_{i/j}$ 值从 1. 49 到 2. 42 再到 2. 01）逐渐代替会计研究（$R_{i/j}$ 值从 3. 02 到 2. 01 再到 1. 46）成为影响中国管理学其他子领域的重要期刊；对于科学学与政策领域，期刊节点相对其他领域都比较小，导致管理知识主要以内部分享与传播为主，无论从纵向的动态演变（见图 2 至图 4）抑或从整体视角（见图 1）来看，相应的管理学期刊主要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不是知识的来源；类似的发现也存在于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只是后者相对于前者似乎更加“保守”，对学科外的其他领域或期刊的影响力似乎更加有限，比如农业经济问题的 $R_{i/j}$ 值在三个时期分别是 0. 58、0. 91 与 1. 06，中国农村经济的 $R_{i/j}$ 值在三个时期分别是 1. 40、1. 12 与 1. 10；对于工商管理领域，同时存在管理知识从外界的获取、在内部的传递与扩散以及对其他学科的输出，与此同时，管理世界（$R_{i/j}$ 值从 2. 68 到 3. 89 再到 4. 19）逐渐成为同时链接此领域其他期刊与其他各子学科的重要平台，而且主要作为知识的来源，其影响力逐渐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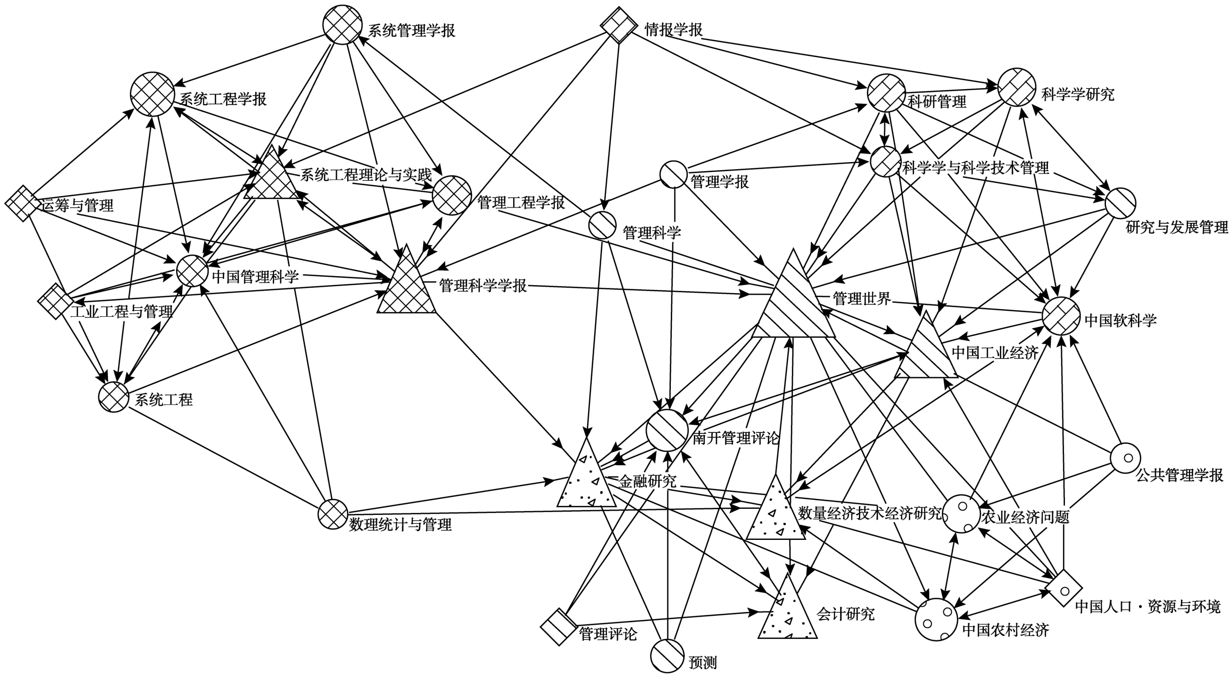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7 年的子学科社会网络图

注：▲表示知识来源期刊，即该期刊在知识传播网络中主要作为知识的提供者。●表示知识传递期刊，即该期刊在知识传播网络中既吸收知识也传播知识。◆表示知识存储期刊，即该期刊在知识传播网络中主要作为知识的接收者。对于 5 个不同的子学科领域，表示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表示财会金融领域、表示工商管理领域、表示科学学与政策领域、表示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后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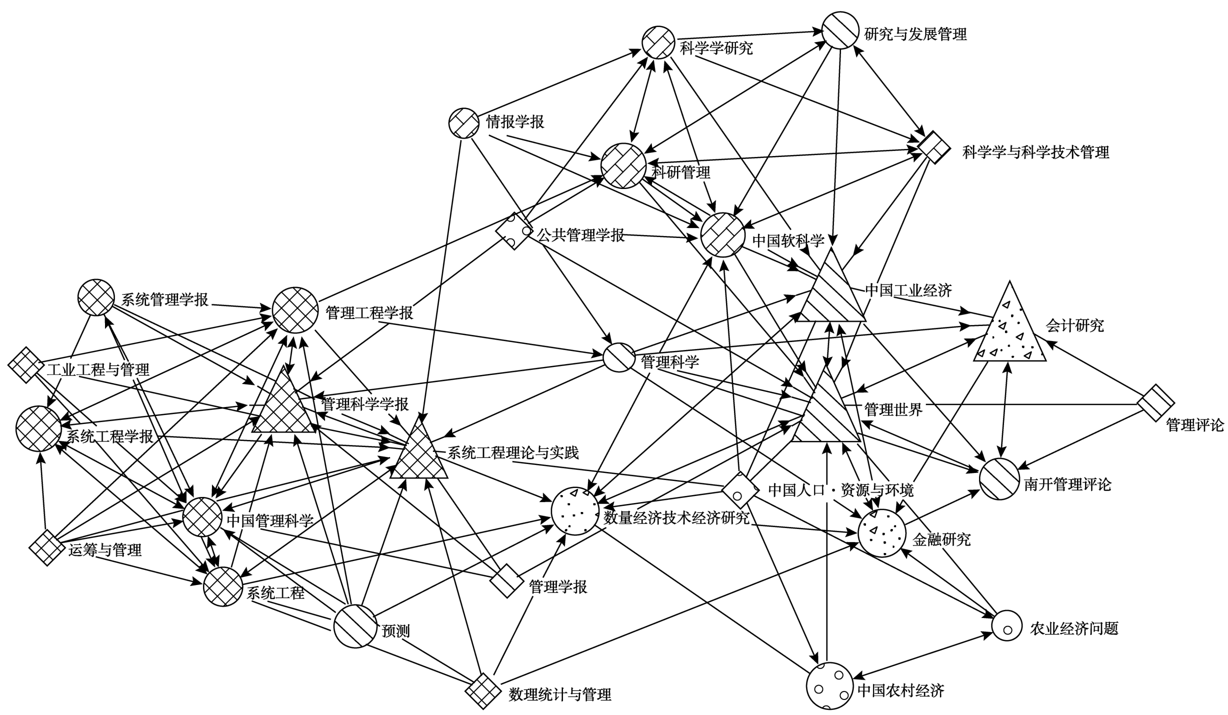

图 2　2006—2009 年的子学科社会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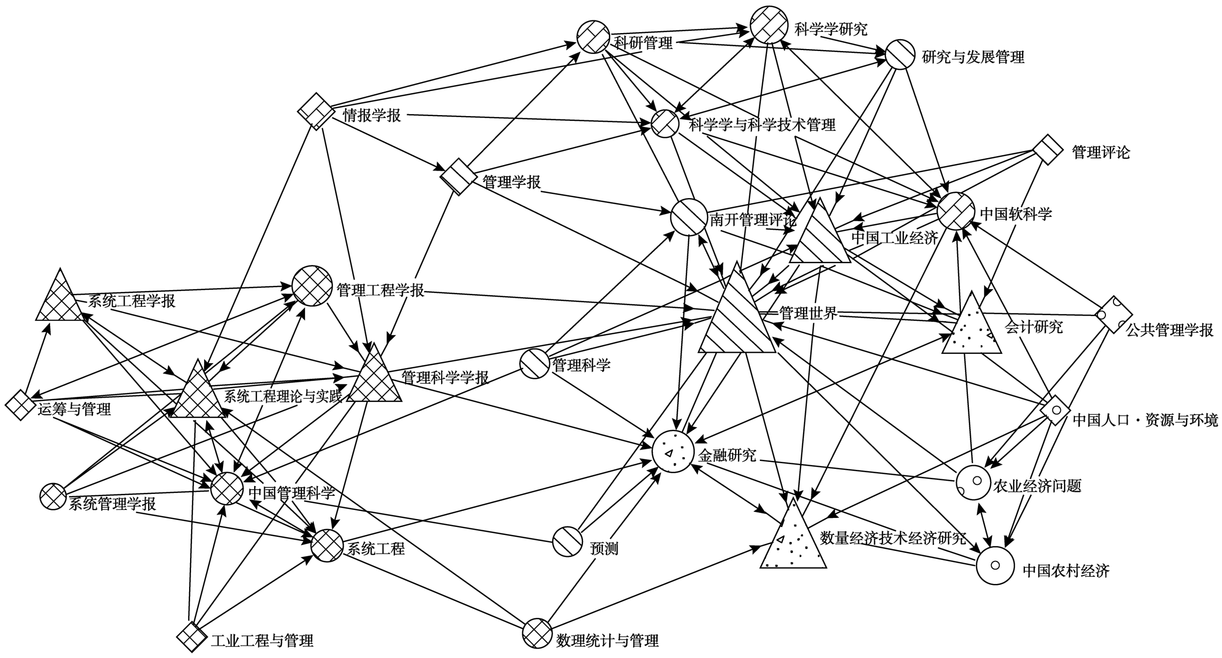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3 年的子学科社会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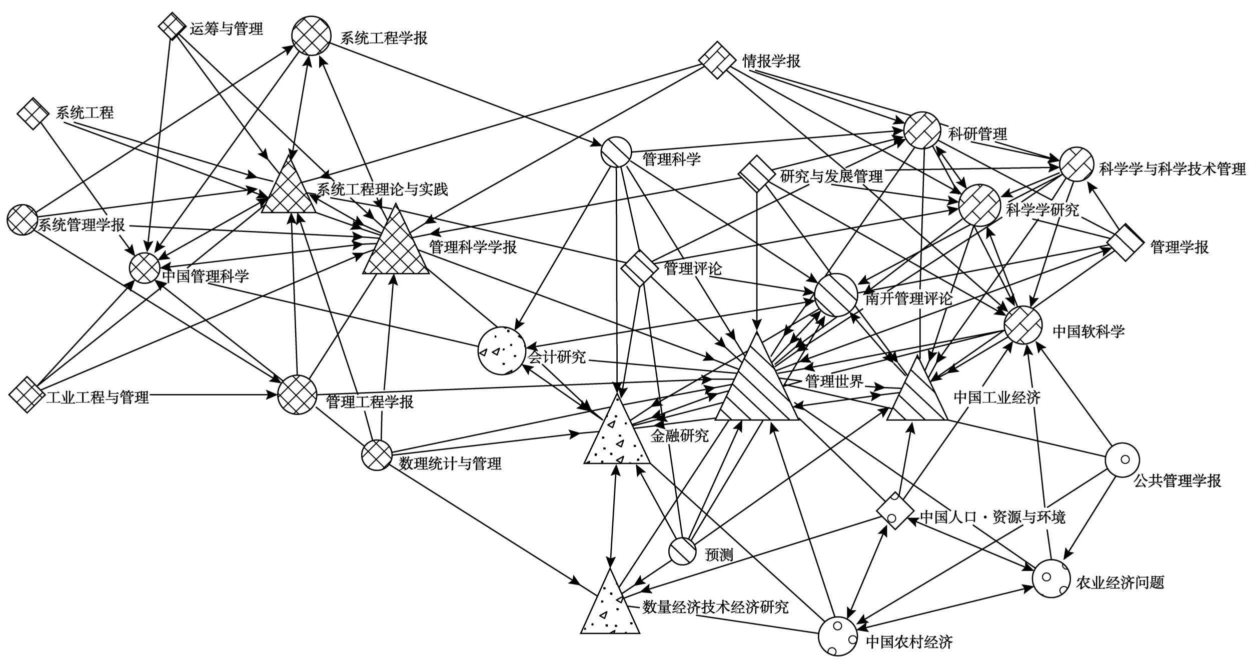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17 年的子学科社会网络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子学科领域一直处于社会网络图的左侧，综合表 3 与表 4 和图 1 至图 4 可知，这个领域内部的知识引用与扩散较多，但是与其他领域的知识流动水平还可以继续提高；从纵向的时

间窗口来看，受这个领域影响（被引用）的子学科领域主要是科学学与政策以及工商管理，而主要是从工商管理以及财会金融两个领域借鉴管理知识；需要注意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对其他子学科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管理科学学报（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2.07、1.87 与 2.53）、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1.64、1.74 与 1.61）、中国管理科学（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0.99、0.85 与 0.60）等三种期刊来实现，但是只有前二者是知识来源期刊。与此同时，这个领域对外界知识的获取比较依靠管理科学学报、数理统计与管理（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0.48、0.65 与 0.55）、管理工程学报（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1.44、1.23 与 1.09）以及系统工程学报（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0.74、1.53 与 1.11）等四种期刊。

综合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结果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可知，虽然财会金融子学科领域只有三种期刊，但是在样本考察期间却可以一直对其他子学科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对科学学与政策领域的影响除外），尤其是对工商管理和农业与公共管理两个领域；同时，这个领域主要从工商管理子学科吸收边界外的管理知识，而很少从其他领域获取管理新知。换言之，这个领域与工商管理数年来一直存在双向的知识流动与“创新的扩散”。

无论从网络图中箭头的方向还是每一种期刊的图示均不难获悉，科学学与政策领域内部也存在比较充分的管理知识双向流动，但是从与外部的知识交换角度来看，这个领域从最初主要对管理科学与工程、财会金融、工商管理以及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均产生影响力，逐渐过渡到只对后两个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三个纵向时期的动态演变来看，这个领域主要从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工商管理借鉴外部知识。因此，这个子学科虽然可以从其他领域获取新的管理知识、在内部进行加工与处理，甚至可以被其他领域借鉴与应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吸收能力”，但是在本文所设定的阈值范围内却仅与工商管理存在双向与充分的知识交流。

对于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而言，综合表 3 与表 4 和图 1 至图 4 可知，从内部来看，期刊之间的交流比较有限。从外部的知识流动来看，一方面，这个领域在 2006—2009 年同时从其他四个领域进行管理知识的吸收与借鉴，但到了最后一个时期已经不再和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进行充分的接触；另一方面，虽然在 2010—2013 年这个领域被工商管理领域引用（不过仅仅局限于一种期刊，即管理世界引用中国农村经济），但是从纵向的管理知识扩散来看，在本文所设置的阈值范围内（$A'_{ij} \geqslant 0.06$）， 这个领域从未被其他任何领域的任何一种期刊引用。换言之，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比较有限，这个领域主要从其他领域吸收管理知识，并主要在本领域内进行消化与转化，但规模都比较小。

无论从 2006—2017 年的整体时间跨度抑或从纵向的单个时间周期来看，工商管理领域始终位于子学科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知识网络的枢纽位置，这个领域内比较重要的三种期刊是中国工业经济（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2.60、2.18 与 2.09）、管理世界（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2.68、3.89 与 4.19）与南开管理评论（三个时期的 $R_{i/j}$ 值分别是 0.98、1.03 与 1.18）。综合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结果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可知，这个领域既在内部存在比较充分的知识交流，又在外部与其他四个子学科存在广泛的知识传播：从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力来看，在三个纵向时间周期内，这个领域均对其他子学科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而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这个领域主要从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学与政策以及财会金融三个子学科吸收管理新知。

从总体上来看，每个领域内的管理知识交流程度似乎均大于其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交换程度；虽然这个趋势从纵向的时间演变上来看有一定的变化，不过管理学在中国主要由工商管理与财会金融两个子学科领域进行链接，尤其是通过前者。

4.3 PFNet 图与熵变值分析

从每个时间周期的 Pathfinder 图来看，在 2006—2017 年整体时间内，由图 5 可知，管理学在中国的不同领域似乎仅有“有限”的知识流动与聚类，也似乎主要体现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农业与公共管理两个子学科领域之间；但是从动态演变的视角来窥探的话，事实却并非如此。具体而言，在 2006—2009 年，图 6 中共有四个聚类，其中最大的聚类来自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排序 2）、预测（熵变值排序 5）、科学学研究（熵变值排序 5）、中国管理科学（熵变值排序 1）、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2）、系统工程（熵变值排序 5）与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5）构成的子网络，同时在 PFNet 图中其他的聚类或由三种期刊组成，或由四种期刊构成；有趣的是，每一个子网络都同时涉及管理学在中国的两个或三个子学科领域，比如根据本文对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30 种期刊的领域划分，图 6 中最大的聚类涉及工商管理领域、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科学学与政策领域及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等四个子学科。因此，根据 Nerur 等（2015）的做法，可以认为这些不同的子领域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而农业经济问题等期刊在维护中国管理学子领域的学科网络稳定中举足轻重。到了 2010—2013 年，如图 7 所示，这个时期共有五个聚类，相比上个时期而言增加了一个聚类；这些子网络中最大的管理知识聚类由以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排序 1）为中心、同时包括研究与发展管理（熵变值排序 4）、管理科学学报（熵变值排序 4）、科学学研究（熵变值排序 4）、系统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4）与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4）在内的子网络构成，而最小的管理知识聚类由中国工业经济（熵变值排序 19）与系统工程学报（熵变值排序 19）组成。这表明，彼时的中国管理学继续侧重管理知识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关联与融合，而这些跨学科的知识整合更多地是由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排序 1）、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排序 3）与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2）主导而推动。到了 2014—2017 年，如图 8 所示，此时期只有一个聚类，但包括 12 种期刊，即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排序 1）、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排序 2）、管理科学学报（熵变值排序 7）、科学学研究（熵变值排序 7）、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熵变值排序 7）、南开管理评论（熵变值排序 4）、情报学报（熵变值排序 3）、管理科学（熵变值排序 7）、管理工程学报（熵变值排序 7）、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排序 6）、科研管理（熵变值排序 5）以及工业工程与管理（熵变值排序 7）。因此，在 Pathfinder 算法的视角下，在 2006—2017 年管理学在中国的不同期刊与不同子领域正在跨学科融合发展，并共同推动管理学在中国的有效进步与演进，而且农业与公共管理领域的中国农村经济（在整体时间区间内熵变值排序 1）、农业经济问题（在整体时间区间内熵变值排序 2）与公共管理学报（在整体时间区间内熵变值排序 9）三种期刊在所有的领域范畴中似乎更占有“结构洞”（Burt，1992）的位置。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管理学在中国的演进与成长，不同期刊与不同子领域构成的学科交叉融合网络更加需

要这三种学术期刊进行稳定性的维护，即使根据前文的分析从表面上来看，这三种期刊吸收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其他学术期刊的知识储存能力（storer 值）与作为知识来源影响其他期刊的能力（sourcer 值）都比较有限。各期刊的熵变值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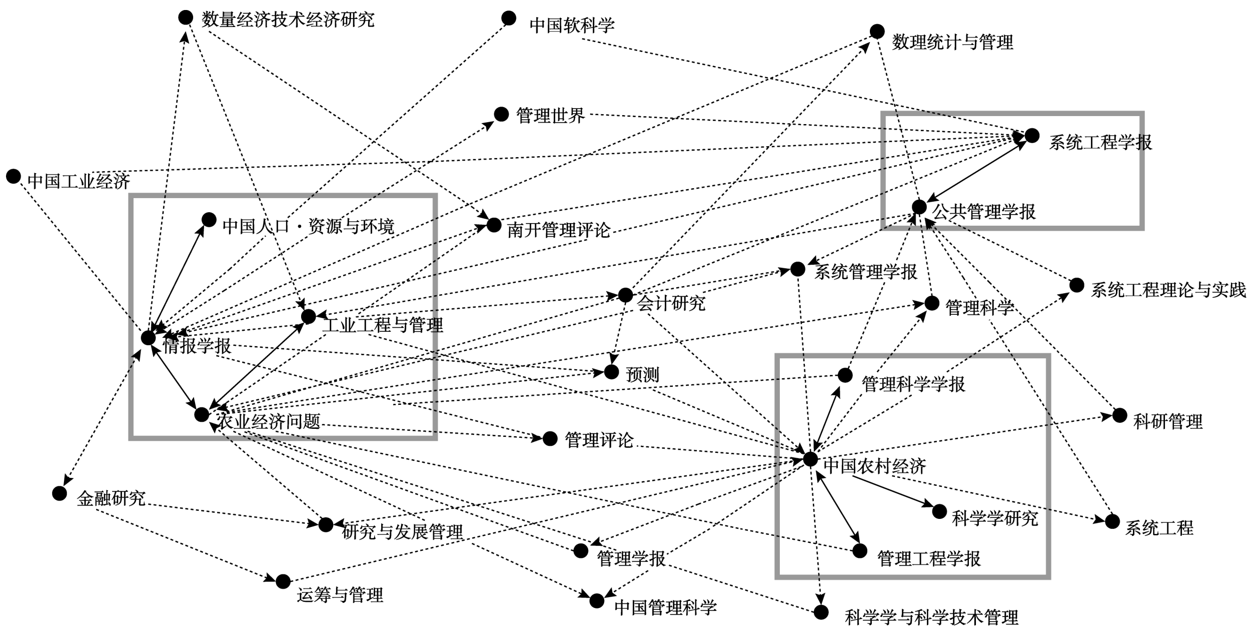

图 5　2006—2017 年整体区间的 PFNet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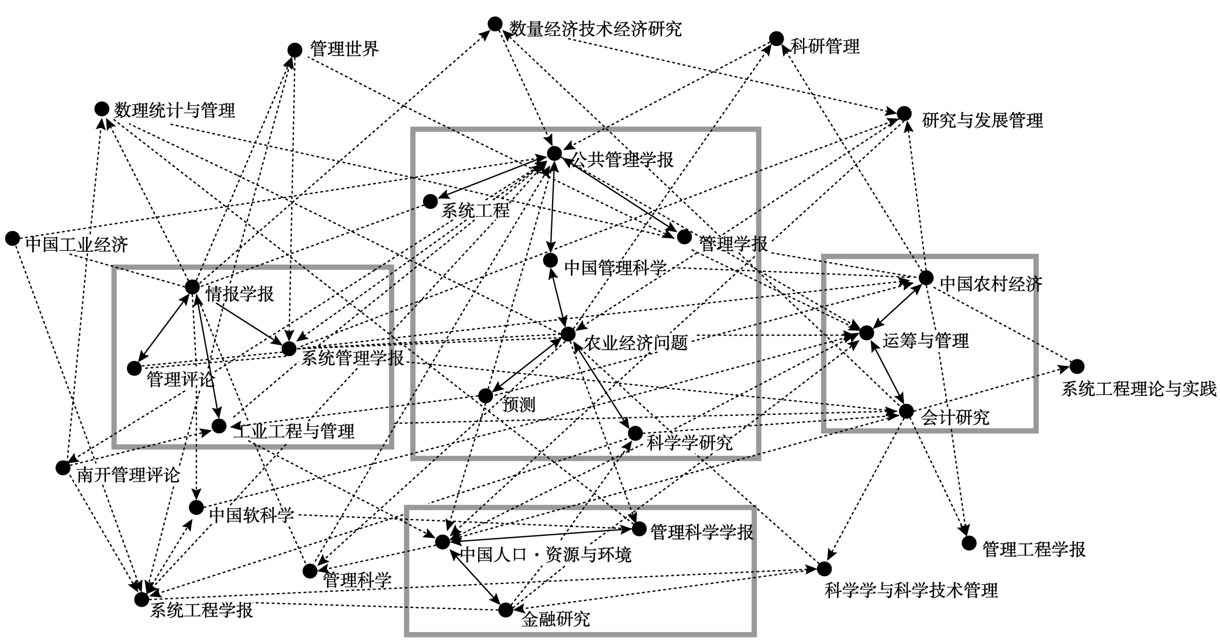

图 6　2006—2009 年的 PFNet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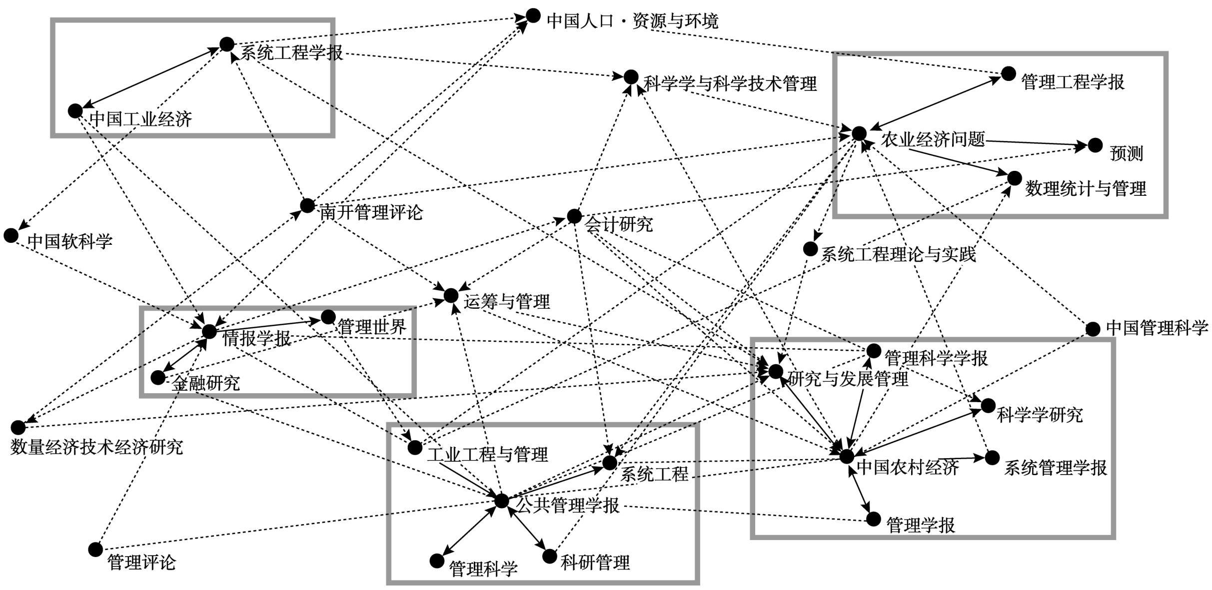

图 7　2010—2013 年的 PFNet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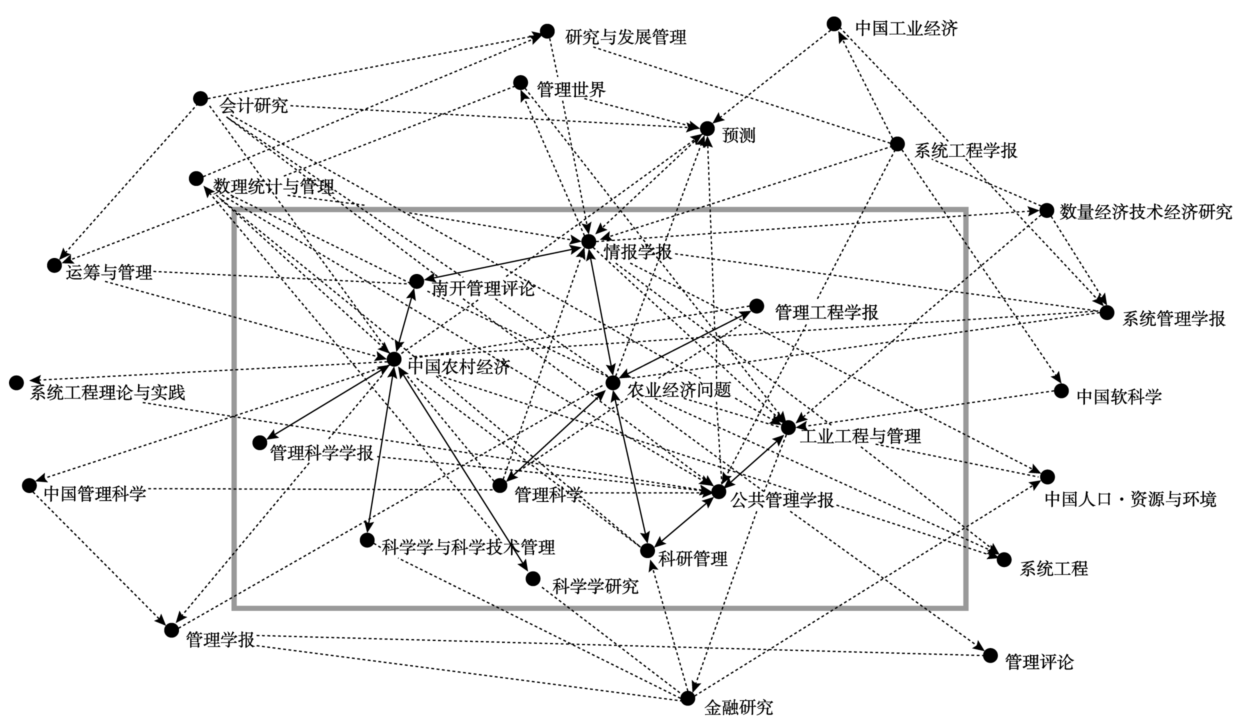

图 8　2014—2017 年的 PFNet 图

表 5　　各期刊的熵变值

序号	期刊名称	2006—2009 年		2010—2013 年		2014—2017 年		2006—2017 年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value	rank
1	管理科学学报	−3.32	14	−2.32	4	−1.32	7	−2.91	4
2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4.9	20	−4.91	21	−4.9	13	−4.91	11
3	管理世界	−4.9	20	−3.32	17	−4.9	13	−4.91	11
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9	20	−4.91	21	−4.9	13	−4.91	11
5	中国软科学	−4.9	20	−4.91	21	−4.9	13	−4.91	11
6	金融研究	−3.32	14	−3.32	17	−4.9	13	−4.91	11
7	中国管理科学	7.98	1	−4.91	21	−4.9	13	−4.91	11
8	系统工程学报	−3.89	18	−3.91	19	−4.9	13	−3.91	9
9	会计研究	−3.32	14	−4.91	21	−4.9	13	−4.91	11
10	系统管理学报	−2.9	11	−2.32	4	−4.9	13	−4.91	11
11	管理评论	−2.9	11	−4.91	21	−4.9	13	−4.91	11
12	管理工程学报	−4.9	20	−2.91	14	−1.32	7	−2.91	4
13	南开管理评论	−4.9	20	−4.91	21	7.05	4	−4.91	11
14	科研管理	−4.9	20	−2.58	10	4.46	5	−4.91	11
15	情报学报	−0.32	4	−2.32	4	7.53	3	−1.32	2
16	公共管理学报	2.81	2	2.00	2	2.14	6	−3.91	9
17	管理科学	−4.9	20	−2.58	10	−1.32	7	−4.91	11
18	预测	−2.09	5	−2.91	14	−4.9	13	−4.91	11
19	运筹与管理	−2.31	9	−4.91	21	−4.9	13	−4.91	11
20	科学学研究	−2.09	5	−2.32	4	−1.32	7	−2.91	4
21	中国工业经济	−3.89	18	−3.91	19	−4.9	13	−4.91	11
22	农业经济问题	2.81	2	−0.32	3	11.86	1	−1.32	2
23	管理学报	−2.09	5	−2.32	4	−4.9	13	−4.91	11
24	工业工程与管理	−2.9	11	−2.58	10	−1.32	7	−2.91	4
25	系统工程	−2.09	5	−2.58	10	−4.9	13	−4.91	11
26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4.9	20	−4.91	21	−1.32	7	−4.91	11
27	研究与发展管理	−4.9	20	−2.32	4	−4.9	13	−4.91	11
28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31	9	−4.91	21	−4.9	13	−2.91	4
29	数理统计与管理	−4.9	20	−2.91	14	−4.9	13	−4.91	11
30	中国农村经济	−3.32	14	4.59	1	8.63	2	−0.32	1

与此同时，在图 5 至图 8 的 PFNet 图形结果基础上，每种期刊的熵变值（缺少某一种期刊时的 Pathfinder 网络与整体 Pathfinder 网络的熵差值）为正，表示如果缺少这种期刊，那么剩余网络的熵值会提高（Nerur et al.，2015），因此该期刊的存在有利于提高 PFNet 的稳定性与有序性。2006—2009 年，有利于提高此期间 Pathfinder 网络稳定性的期刊分别是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为 2.81）、中国管理科学（熵变值为 7.98）、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为 2.81）；到了 2010—2013 年，有利于提高此期间 Pathfinder 网络稳定性的期刊主要是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为 4.59）与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为 2.00）；在 2014—2017 年时间跨度内，有利于提高此期间 Pathfinder 网络稳定性的期刊依次是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为 11.86）、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为 8.63）、情报学报（熵变值为 7.53）、南开管理评论（熵变值为 7.05）、科研管理（熵变值为 4.46）与公共管理学报（熵变值为 2.14），这些期刊的熵变值均大于零。不过，在 2006—2017 年整体时间区间内，虽然最有利于提高此期间 Pathfinder 网络稳定性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熵变值为-0.32）、农业经济问题（熵变值为-1.32）与情报学报（熵变值为-1.32）且排名前三，但是这些期刊的熵变值均为负。换言之，在 2006 年以来 12 年的时间内由中国管理学 30 种重要的学术期刊互相引用与被引用构成的知识网络结构中，从表面上来看，总体上每一种期刊对其 Pathfinder 结果的稳定性与有序性都似乎有待提升，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管理学在中国逐渐走向成熟（谭力文，2013），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在促进其他期刊之间的管理知识有效流动时也开始促进整体 PFNet 的稳定性，从最初仅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农业与公共管理两个领域逐渐涵盖工商管理子学科领域的相关学术共同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问题这两种期刊对中国管理学子领域的学科交叉网络稳定性的贡献不仅不容忽视，甚至还举足轻重与不可替代，这很可能也是管理学在中国未来演进的一个客观发展趋势。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是评价中国管理学 30 种重要学术期刊的质量，而是通过这些比较权威、比较有代表性以及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传播与“创新扩散”平台，试图基于新颖与多元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如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分析、Pathfinder 算法、熵值分析），揭示 2006—2017 年中国管理学的不同期刊与不同子学科领域是逐渐走向跨学科融合，还是走向各自为政的狭隘局面，同时考察其相应的演变路径与动态。

第一，March（2004）将“小农意识”概念引入管理学科，既担心与警惕“小农意识”对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危害，又鼓励通过跨学科学习与知识互动来打破这种知识狭隘的局面。本文的经验结果表明，管理学在中国的各子学科并没有完全陷入这样的“小农意识”。从管理知识的吸收（storer 值）与传播（sourcer 值）视角来看，管理科学与工程、财会金融、工商管理、科学学与政策以及农业与公共管理等五个不同领域均与其他子学科有不同程度的管理知识交流，其中工商管理与财会金融两个领域不仅自身正在跨学科发展，还在融合其他不同领域方面占据枢纽位置。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从纵向的知识流动演变来看，管理学在中国的一些领域相对更加侧重其学科

内部的知识交换而不是与其他领域之间进行知识的双向沟通和传播，因此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管理学在中国未来的跨学科融合发展应该还大有可为。同时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领域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期刊如管理科学学报、中国软科学、管理世界等正在转型并积极承担这样的知识融合角色（如表 3 与表 4 以及图 1 至图 4 所示），不仅正在促进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双向流动与互动，还正在提高每一个子学科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动态管理能力以及开发与探索平衡能力。同时，从学科交叉的网络稳定性维护（Pathfinder 分析、熵变值分析等）视角来看，不同于 Nurer 等（2015）发现战略管理的“碎片化→巩固整合→市场细分”的学科演变路径规律，管理学在中国 2006—2017 年不仅正在逐渐走向融合，而且其各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还一直得益于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学术期刊对管理知识社会网络稳定性的建构与维护。虽然这些期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遴选的 30 种重要期刊交流网络中的知识储存能力与作为知识来源的能力均相对比较有限，但在维护管理学在中国各领域构成的学科交叉网络稳定性中一直占据核心位置，甚至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来看，管理学在中国的演变之所以没有陷入“小农意识”的尴尬局面，本文推测，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学科整体布局和制度设计高瞻远瞩，积极鼓励从不同的角度来打破不同子学科之间的学科壁垒，或者因为不同的子学科之间一直有比较活跃的、促进管理知识交换的学术明星与学术规范。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已有少数学者尝试基于纵向的历时数据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 30 种期刊之间的知识交互、社会网络结构与聚类特征，但主要基于比较单一的方法和有限的视角（如张自立等，2011；张紫琼等，2010）。与之相比，本文采用了新颖与多元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如 Log-multiplicative 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分析、Pathfinder 算法、熵值分析）；这些方法相互补充，揭示样本时间跨度内管理学在中国的不同期刊与不同子学科领域是逐渐走向跨学科融合，还是走向各自为政的狭隘局面，同时考察其相应的演变路径与动态。其中，Log-multiplicative 模型能够精确评估期刊在引用网络的影响力，判断其作为知识来源或知识吸收的重要性（Nerur et al.，2015），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全面呈现不同期刊集群之间的复杂联系与互动模式，清晰地揭示出期刊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如发现潜在的知识孤岛或紧密合作的期刊群体（Meredith and Pilkington，2018）。Pathfinder 算法与熵值分析则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出发，确定哪些期刊对知识网络的稳定性起着关键支撑作用，为理解期刊在知识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更细致的量化依据（Nerur et al.，2008；Sullivan et al.，2011）。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更有利于从认知层面（Gupta and Govindarajan，1991；Nurer et al.，2015）系统与深入地揭示管理学在中国的“小农意识”知识流动格局及其演变动态。

第三，在实践应用方面，本研究通过对期刊引用关系的深入分析，在实践层面为期刊的定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从单种期刊的知识传播角色来看，如果 21 世纪以来中国管理学的顶级期刊如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正在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并借鉴西方的主流理论范式（曹祖毅等，2018，2013），那么从本文的表 3 和表 4 结果可以推断，这些基金委遴选的重要期刊在近十几年来虽然从国内其他管理学期刊的知识获取比较有限，但是恰恰可能正在加大引用英文权威期刊的广度与深度，逐渐将西方的管理概念、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管理范式等重要的管理知识引入中国管理学及其不同的子领域，从而正在通过其学术影响力不断促进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

化融合进程。换言之，这些国内的中文权威期刊不仅在融合不同领域的管理知识方面发挥着知识扩散与桥梁的作用，还很可能在融合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本土管理问题方面举足轻重。与此同时，从管理知识的双向流动视角来看，因为工商管理领域不仅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知识开发与知识探索能力，还在2006—2017年有效链接了其他子学科，从而促进了不同领域之间的知识扩散，甚至几乎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存在双向的知识消化与转化，所以如果这个领域主要关注企业这一研究对象（Li and Tsui，2002），那么或许，管理学者对企业这一主体的关注应该成为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海尔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并被世界关注。更为具体的，Daft 和 Lewin（2008）指出不同的管理学期刊应该稳固自己的独特定位从而差异化发展，如鼓励 *Organization Science* 等旗舰型期刊应专注于管理思想创造与理论创新，而非直接参与管理知识的广泛传播或为管理实践提供直接的、工具性的应用指导；然而，本文的经验结果却表明，即使某一种具体的管理学期刊在知识生产的定位中对其他期刊的管理思想创造影响较低，但却可以在维护知识网络稳定性的定位方面不可或缺（如中国农村经济）。因此，科技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合理配置资源、推动期刊合作交流。这将为期刊在管理学跨学科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提供精细洞察与实践指导。

第四，鉴于管理学术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是管理学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必须直面的议题（曹祖毅等，2018；张玉利等，2021），本文从知识流动与融合的视角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分析思路。管理学者对转型时期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宏观管理国情、农林经济管理等进行不同视角与不同程度的考察，会导致中国管理学各领域中科学严谨性（rigor）与实践相关性（relevance）二者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弥合或脱节（曹祖毅等，2018），所以学术群体或可以从“小农意识”的视角或跨学科融合的角度出发，尝试重新审视各自领域乃至学科整体上的管理学术和管理实践的必要张力与矛盾（Bartunek and Rynes，2014），从而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新的贡献。根据 Daft 和 Lewin（2008）、Corley 和 Gioia（2011）等研究，管理学术知识的相关性既可以面向管理实践（而且这也是中国管理学者 21 世纪以来持续关注的研究议题，更是现阶段学术共同体的争论焦点；如曹祖毅等，2018），又可以面向科学共同体（周泽将等，2021），因此，本文基于中文管理学的数据为继续探讨管理学不同的期刊与不同的学术领域如何对其他期刊或者学术领域产生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观察视角，比如从本文的经验结果获悉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问题均具有较高的熵变值（见表 5）并在 PFNet 学科交叉网络中（见图 5 至图 8）位居核心地位时，管理学者或可以尝试以中国管理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领域为突破口，来关注管理理论与农业管理实践的必要张力（Van de Ven and Johnson，2006），或尝试同时考察中国管理知识的“三农”实践相关性与“三农”学术相关性。

第五，从更为抽象的理论层面来看，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知识探索可以扩展学科的边界从而促进学科之间更多的交流，而知识开发有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发展程度。本文的经验结果其实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案例与经验支持，比如，中国的工商管理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边界，积极从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学与政策以及财会金融等子学科吸收知识，体现了对新知识的探索；此外，在工商管理领域子学科内部存在比较充分的知识交流，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作为知识的来源和传播枢纽，促进了知识的开发利用。这表明，通过有效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或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保持探索与开发的平衡，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学科的发展。当管理学在中国

的不同子领域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探索学习与开发学习时，这其实也为今后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入手，探讨不同的学科之间如何保持探索与开发的平衡奠定了基础，比如考察当农林经济管理领域继续进行知识开发时，这个领域如何进一步提高知识探索能力以从中国管理学的其他学术领域获取专业知识并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力。更进一步，虽然学者普遍认为，不同的学科范式因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而导致不可通约（Kuhn，1970），但是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学在中国不同的子学科之间并没有因为各自的范式及其成熟程度不同而完全孤立；相反，事实却表明，21 世纪以来，管理学在中国的跨学科发展可能正在促进——从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如学科交叉、对网络稳定性的维护——其不同子学科之间的范式对话，这可能也为未来基于 Schultz 和 Hatch（1996）的范式“交互策略”或者 Gioia 和 Pitre（1990）的范式“跨越”方法来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和解释逻辑上探讨管理学在中国的科学演变与凝聚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行路径。

6. 未来展望

本文主要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设定的 30 种重要与经典的学术期刊为实证研究样本，提供了比较客观、深入也比较系统的研究结论，未来可从制度环境与学术规范等角度进一步探讨“小农意识”的成因与影响因素，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小农意识”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或可以结合定量与定性方法，例如对期刊编辑政策、审稿偏好和文章选题倾向进行文本分析或深度访谈，也可以收集学术圈人际网络和学科政策分配方面的资料，从而更有效地将期刊本身特质与外部生态环境因素加以区分；或可进一步拓展样本选择空间与范围，将分析视角延伸至西方顶级的管理学期刊以及国内外的对比分析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手工收集数据）将时间窗口追溯至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及延伸至 2018 年后的数据，以验证与拓展本文的相关结论，甚至还可以考虑重大事件对“小农意识”问题的冲击与影响；或单独考虑管理学在中国的工商管理子学科中的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与组织理论等更为细分的学术领域，以进一步深化本文发现的与“小农意识”有关的研究结论。与此同时，本文根据现有的文献依据以及相关的官方网站，将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划分成五个不同的子学科领域，未来或可以尝试从新的分类法，或从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流动关系入手，进一步考察管理学在中国的“小农意识”议题。我们希望看到，不仅在不同子领域层面上，而且在每一个子学科内部以及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都存在广泛、有效的知识流动与融合，而不是一些学者所担心的不同学科内部或者学科之间逐渐走向知识狭隘主义。

◎ 参考文献

[1] 曹祖毅，谭力文，贾慧英. 脱节还是弥合？中国组织管理研究的严谨性、相关性与合法性——基于中文管理学期刊 1979—2018 年的经验证据 [J]. 管理世界，2018 (10).
[2] 曹祖毅，谭力文，贾慧英，等. 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

道？——基于2009—2014年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与反思［J］. 管理世界, 2017 (3).
［3］谭力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
［4］张金隆, 蔡玉麟, 张光辉. 百期奠基　十年筑梦——《管理学报》十年回顾［J］. 管理学报, 2014 (3).
［5］张玉利, 吴刚, 杨俊, 等. 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战略思考与举措［J］. 管理评论, 2021 (4).
［6］张紫琼, 张自立, 叶强, 等. 基于互引网络的管理学部重要期刊内部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7］张自立, 姜明辉, 李向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重要期刊异质知识交流能力研究［J］. 管理学报, 2012 (6).
［8］张自立, 张紫琼, 李向阳. 基于互引网络的管理科学部重要期刊相对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1 (1).
［9］张正堂. 如何提升中国管理学研究对实践的贡献——基于管理知识生产传播模型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10).
［10］周泽将, 王浩然, 修宗峰. 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基于Nsfc管理科学a类期刊刊文（2013—2020年）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1 (9).
［11］Adler, N. J.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 Boston, MA: PWS-KENT Publishing, 1991.
［12］Agarwal, R., Hoetker, G. A faustian bargain? The growth of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disciplin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6).
［13］Barney, J. B. Zhang, S.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 (1).
［14］Bartunek, J. M. Rynes, S. 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are alike and unlike: The paradoxes of academic-practitioner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40 (5).
［15］Bergh, D. D., Perry, J. Hanke, R. Some predictors of SMJ article impac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 (1).
［16］Biehl, M., Kim, H. Wade, M.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academic business disciplines: A multi-method citation analysis [J]. Omeg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34 (4).
［17］Clark, T., Gospel, H. Montgomery, J. Running on the spot? A review of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9, 10 (3).
［18］Cooper, R. B., Blair, D. Pao, M. Communicating MIS research—A citation study of journal influence [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1993, 29 (1).
［19］Corley, K. G. Gioia, D. A.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 (1).

[20] Daft, R. L. Lewin, A. Y. Rigor and relevance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Idea migration and academic journal evolu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 (1).
[21] Fabian, F. H. Keeping the tension: Pressures to keep the controversy in 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 (2).
[22] Fei, X., Hamilton, G. G. Wang, Z.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 translation of Fei Xiaotong's Xiangtu Zhongguo,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3] Gates, A. J., Ke, Q. Varol, O. et al. Nature's reach: Narrow work has broad impact [J]. Nature, 2019, 575 (7781).
[24] Gioia, D. A. Pitre, E. Multiparadigm perspectives on theory building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0, 15 (4).
[25] Gupta, A. K., Govindarajan, V. Knowledge flow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trol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
[26]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7] Li, J. Tsui, A. S. A citation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1984-1999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 (1).
[28] Mandard, M.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Motives to cite in management research [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22, 19 (1).
[29] March, J. G. Parochialism in the evolution of a research community: The case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J].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2004, 1 (1).
[30] Meredith, J. R. Pilkington, A. assessing the exchange of knowledge between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other fields: So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8 (60).
[31] Mingers, J., Leydesdorff, L. A r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cientometric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5, 246 (1).
[32] Nerur, S. P., Rasheed, A. A. Natarajan, V.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field: An 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 (3).
[33] Nerur, S., Rasheed, A. A. Pandey, A. Citation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An analysis of idea migration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37 (6).
[34] Ozbilgin, M.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cademic parochialism in editorial boards of the "top" 22 journals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 Personnel Review, 2004, 33 (2).
[35] Pieters, R. Baumgartner, H. Who talks to whom? Intra-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of economics journal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 (2).
[36] Pilkington, A. Meredith, J. R. The diffusion network of research knowledge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18, 38 (2).
[37] Scandura, T. A. Williams, E. A.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management: Current practice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6).
[38] Schultz, M. Hatch, M. J. Living with multiple paradigms: The case of paradigm interplay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tudi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 (2).
[39] Shafique, M. Thinking inside the box?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base of innovation research (1988-2008)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 (1).
[40] Sullivan, D. , Nerur, S. P. Balijepally, V. G. Source or storer? IB's performance in a knowledge network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1, 42 (3).
[41] Tsui, A. S. Editor's introduction-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 (1).
[42] Van de Ven, A. H. Johnson, P. E. Knowledge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 (4).
[43] Vermunt, J. LEM: A general program for the analysis of categorical data [M]. Tilburg: Department of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1997.
[44] Wren, D. A. Bedeian, A. G.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9.
注：参考文献受篇幅所限未全部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

Is Management in China Rushing Towards “Creeping Parochialism”?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30 Important Management Journals Enacted by NSFC

Cao Zuyi[1] He Fenfen[1] Jia Huiyi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2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200)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forty years ago,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been achieving rapid development and is gradually obtaining “legitimacy”. So, is the flow of knowledge between the sub-disciplines of management in China sufficient, or has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territoriality emerged, hindering knowledge transfer between sub-disciplines? Have the sub-disciplines fallen into a “parochialism”? Based on the 30 management journals enacted by the NSFC of China, this article employs novel and diversified empirical methods, including the Log-multiplicative model, Pathfinder algorithm, and entropy analysis, to examine,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management studies in China have evolved towards a “parochialis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fields and journals within management in China are not isolated but have evolved through varying degree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Knowledge exchange and diffusion among the field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nd other sub-disciplines exist to varying extents. Journals such as *Management World* facilitate the bidirectional flow of knowledge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and journals in management, while journals like *China Rural Economy* contribute to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networks.

Key words: Management in China; Creeping parochialism;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earch; NSFC's 30 journals

专业主编：陈立敏